

## 郑全对省港大罢工发动情况的回忆

我是一个木工,曾经加入过木匠工会。在香港时,我没有和中夏同志接过头,那时候由杨殷同志直接领导我。我认识杨殷同志是通过梁复然关系的。那时梁复然住在我们的工会,天天讲故事给我们听,他是在找积极分子,慢慢地就给点事情我做,最初叫我到黄泥涌一个叫李义宝的小学教员那里拿宣传文件,分给各个工会,后来就叫我发传单、通讯,又召集我们开会,渐渐我对这种工作就发生了兴趣,当时我才二十一二岁。我认识杨殷同志就是在黄泥涌小学里,那时候是1922年海员罢工时期的事情。

1925年省港罢工发动初期,我还拿着斧头做工,杨殷叫我不做工,给饭我吃,告诉我不干革命,生活是永远这样苦的。我参加革命活动,一开始是负责到工人宿舍及馆口与工会俱乐部等地方了解情况,了解工人对“五卅”的反应。我做这项工作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因为我在木匠工会时搞过交际。以后杨又叫我去散发传单,工人们接了传单之后,就在茶楼、宿舍议论开来了。经我向杨殷同志汇报后,杨就决定在海员工会召集会议。当时海员工会的威信是很高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西营盘杏花楼开会,我们发信请各工会派人出席。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使全社会人士、工团大团结(当时香港社团很复杂,有几派:一是工团派,一是工亲爱,一是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工作很困难),鼓励全港人士对“五卅”惨案的抗议。开会前两天我们曾经发过两次传单,这次发得

很普遍,传单内容说明“五卅”惨案的真相及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

在杏花楼(大部分同志回忆会议地点在车衣工会——整理人注)开第一次会议时,由苏兆征同志讲话,他指出:“五卅”惨案工人如何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说“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可能会在香港发生,香港工人应采取什么态度等等。出席的工人代表听报告后都磨拳擦掌,愤怒万分,很多工会领袖都起来表示意见。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会议,跟着就由邓中夏同志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工团总会、工亲爱(黄色工会)的会议,决定举行罢工。当时大家都同意罢工和向英方提出条件,并且决定了罢工日期。

当时“工亲爱”这个黄色工会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三合会的分子和商人),只挂着一个工字招牌,其实并非纯粹的工会,因此斗争也十分复杂。

工人方面的条件提出后,英方不但不接受,反而加以压制,于是又决定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还召开过党团会议及工团总会会议、工团总会与“工亲爱”联席会议,修正向英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会议等,这次会议也是在杏花楼召开的,范围更大,会议也十分严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告全港同胞书及宣布定期罢工向英国帝国主义提出条件在开会时英方派密探到场,可是给我们发现,大骂他们是走狗,把他们轰跑了。会议决定罢工,大家一致举手,只有机器工会主席韩文惠不但不举手,而且中途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只

开了一个多钟头。会后都回去布置。搭车搭船回广州的,只要到工会领取证明便可以。第二天街上水泄不通,人心惶惶。罢工、罢市、罢课,回广州的工人都纷纷起程。工人陆续发动起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人们大多数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香港非常紧张,粮食有问题,加上纠察队鼓吹“你们不回广州,饿都饿死你们”,因此部分群众也十分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黑社会的人物,也跟着回来想捞点油水。当时有些人坐车、坐船回来的,也有步行回来的(回来的路线:香港到广州或江门、澳门、中山、厦门、梧州等)运动发展得非常快,这一点连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在新的情况下,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是发传单(大批传单由印刷工会负责,他们在扯旗山顶的英国高级酒店地下室进行工作)。发传单主要是通过一些积极分子去执行。当时杨殷同志分配我的工作到各工会了解情况,了解他们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罢工情况进展得怎样?有多少人已回广州?坐船的、步行的人怎么样?并根据情况加以解决等。当时有些罢工工人在码头上因为等船而在那里睡觉,等了几天几夜。我们就发动工会提供茶水,发动小贩卖东西给他们吃,在进行此工作时均以工会的名义,而当时海员工会所做的工作为最多。步行的要经沙田回广州,帝国主义派巡捕来干涉,我们就在群众面前揭露和打击他们,结果他们也不敢怎样。在广州我们也布置很多接送站。

罢工运动总的来说,虽然已发动起来,但还不是完全顺利,

主要是机器工会、交通工会和商人还在那里作怪。机器工会主席韩文惠是个买办,他对机器工会统治得很紧,凡要到“海军船坞”(英兵舰修理厂)、“太古”(英国主要商船公司)和红磡船坞(中国人投资兴办的船厂)等工厂做工的,必须经过机器工会的介绍。机器工会的工头掌握了这3间厂工会。有些人参加了工会,但不知道这个工会的内幕。这个工会与广州机器工会也有联系。韩文惠当时不但不支持罢工,反而与英帝勾结,压制工人罢工。他们到宿舍恐吓工人说:“谁要是参加罢工,就永远不给工做。”那时,工人们找到一份工做是不容易的,要给工头一大笔钱,特别是那些有十年八年工龄的老工人,思想顾虑更大,怕参加罢工后,一家生活无着。另外,本来电车工会已罢工了的,但一边罢工,工贼却一边找人顶替。后来甚至使用搭车不收钱的手段,虽然如此,但坐车的人依然寥寥无几。

当时我把情况向杨殷同志汇报后,他主张用暴力去解决。他写了字条叫我到深圳找铁甲车队徐成章(他是铁甲车队党代表,保卫铁路和罢工工人的武装队伍)取2支手枪和3颗炸弹。我到了深圳后,想化装成一个农民,便天天去晒太阳,留长了头发,一共晒了7天,皮肤晒黑了,头发也长了,于是买了一对旧竹箩,装满水红柿和鸡蛋,把手枪和炸弹装到里面,由沙田过油麻地走到杨殷的亲戚家里,那是杨殷的姐夫家。他姐夫是海关职员,又是英帝的卫士队的人,是个基督教徒,杨便利用这个家作为我们的机关。

我的任务完成后,杨又叫我把武器运到香港去。于是我又只好几天不出街,以使皮肤变白,扮成一个“侍仔”,由他的亲戚给我写一英文卡片,用饭盒将武器装好,说是送饭到洋行去的。结果过海时,码头的检查员看了看我的卡片,没有检查就给我混了过去。我把武器运到香港中环街市对面的“诚托”办馆(专为轮船办理伙食的商店)。这地方是杨殷经常出入的,有了武器,杨便马上分配工作。他叫我把一支手枪交给“同志社”(海员俱乐部)的一位海员工友去暗杀韩文惠,同时叫我监视那工人,因这人原是个流氓。韩文惠这人是不会被认错的,他的特点是出门从不坐汽车而坐“三抛轿”(轿是前面抬杆长,由两人一前一后抬着,后面抬杆短,由一人抬),他认为这样骑在别人的脖子上才算“架势”(威风)。同时,这顶轿[轿]盖上还挂着一条布条,写着一个大大的“韩”字。为了准确地击毙他,事先我还弄清了他的出入时间、地点。说也奇怪,在我们布置好暗杀他后,他却三四天都不出门,后连那位工友也失了踪。在我把枪交付给这工友的同一天,我还把两个炸弹另交付给两个海员工人(流氓出身),一个准备炸中环街市,一个准备炸铜锣环总车站。交武器的地点约定在某茶居,一个是戴黄毡帽,一个是穿西装带[戴]花领带的。那天正在下雨,我用雨衣把炸弹包了起来,到那上环高升茶楼时见到两人说:“这雨衣交还给你。”炸弹交给他们后,他们同样是没有进行工作(这些人都是海员工会介绍来的)。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杨殷见到了我,便说:“两支手枪去了

一支,3个炸弹去了2个,一事无成,怎么办?自己动手吧!”我说:“好吧。”于是我买了一斤花生肉,把炸弹装到里面去,把它包成三角形,那炸弹是旧式的,要燃点引火线才会爆炸。我上了电车,便坐在司机背后的座位上,为了要找一个能造成最大影响的地点下手,我便乘着车转来转去,后来快到中环街市时(最热闹的地方),我就抽起烟来,把导火线烧着,然后转身便跳车。可是碰巧有人跳上车,那我只好把来人撞倒,自己也跳了下去,但不幸我却摔倒了。这时我也顾不了痛,拼命往人行道跑去。说时迟,来时快,轰隆一声,炸弹就在车上响起来了,车被炸坏了。路上行人纷纷逃跑,这时,人跑我也跑,一直向沙田码头跑去。当我坐上过海渡船时,才发现我的一只手已跌伤了,手肘的骨头长长地突了出来,痛得厉害,于是我只好去找一个叫杨八妹的医生看看。那医生问我带多少钱,又问我是怎样跌伤的,当时我只有8块钱付了给他,还骗他说是从高空掉下来的。在动手术的时候,我痛得屎尿都流了出来。他给我上了药,还给了一些药,嘱咐我以后不用再去。这次炸电车,除了司机受伤外,其余的乘客一个都没有受伤。由于这部车坏了,结果使大半天交通都得停顿下来。事件发生后,杨殷同志便受到了党的批评。

我受伤后,没有出门。伤一好,杨殷同志马上把我调回广州工作。回广州后,我开始同中夏同志发生联系。

节选自郑全:《罢工的发动及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彭思记录整理),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

存稿选编》（第3卷 省港大罢工 港澳华侨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题目及“[]”内文字为本专栏编者后加。

致  
親  
友